



迷失伦敦： 道德治不了“多元文化”的虱子

■ 应辰（发自英国巴斯）

前 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最近接受政治杂志《Total Politics》采访，在谈到2012年伦敦市长选举以及保守党最近对于打击骚乱分子的强硬立场时说，“我毫无疑问会赢得明年的选举，这是很简单的善恶分别，在我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现任保守党籍市长）之间做出选择，就像你是选丘吉尔还是希特勒。”

就在不久前，在鲍里斯匆忙中断假期、赶回伦敦处理骚乱事件期间，网络上流传着一张鲍里斯傻呵呵骑着单车的搞怪照片，下面文字写着，“别担心！你们的市长回来啦！”回伦敦的第二天，鲍里斯加入了克罗伊登区市民自发组织的扫帚游行，手抄扫帚与民众站在一起的鲍里斯迅速占领各大新闻网站的头版。鲍里斯的扫帚，一方面延续了这位市长的无厘头形象，另一方面也是一出手段高明的政治表演：扫帚的寓意，既有打扫混乱、重建信心；又有自卫武装，坚决抵抗歹徒的含义。这种平民姿态的决心，传达出的是保守党对于犯罪

一贯所持的强硬态度。

利文斯通和鲍里斯，前后两任伦敦市长，都是敢想敢做且又善于挑事的性情中人，两人的一言一行被视为是英国左右两派政见的夸张版本。

整个英国的迷失

对于此次骚乱，首相卡梅伦发表的声明言辞格外犀利，三次声明的用词从“无法接受”到“彻头彻尾的犯罪”再到“零容忍”，卡梅伦代表了英国保守派对于骚乱的一种解读，即将问题归咎于整个社会“不断下降的道德水平”，以及日益缺失的公民责任感。

但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却有超过8000人参与一个在线请愿活动，主张政府不应对于骚乱者施以苛政重典，而应该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与此同时指出保守党上台以来的财政削减才是此次骚乱的主因，认为政府对于底层穷人的“抢劫”才是酿成骚乱的真正原因。尽管暴徒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但对青少年是如何成为暴徒的思考、一时之间成为了民众对于政府紧缩政策不满的宣泄

口。

然而，在BBC播出的公共辩论类节目“提问时分”（Question Time）中，类似言论不停地遭到台下观众的严厉指责。这至少说明一个道理：对于很多本本分分的市民来说，去了解暴徒的心声显得不可理喻，身为暴乱的受害者，显然只需要知道暴徒应该绳之以法的简单道理。

如此看来，在这场骚乱中迷失的不仅仅是这些加入“打砸抢狂欢”的青少年，可以说对于事件本身的态度，整个英国都迷失了。

由底层的不满引发大规模骚乱，在英国绝非首次。1981年的那次骚乱，几乎在同样的地点，同样是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同样是由对警察的不信任所引发，同样是有大量的非洲和加勒比裔青年参与。尽管经济萧条引发的社会动荡似乎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历史并非在简单重复。当年的那场骚乱，一开始其本质是有强烈目的性的和平抗议活动，无序的流氓主义是后来才逐渐体现出的衍生物，参与抗议的移民权益团体

也义正辞严地把自己同骚乱划清界限。而在此次伦敦骚乱事件中，我们看不到他们在反对什么，想要争取什么，仅仅是一种宣泄，甚至只是因为无聊而去砸商店来打发时间。

“流氓”和“底层”，这些骚乱参与者的身上都几乎同时拥有这两张标签，在舆论对于骚乱原因不停追问并相互指责的口水战中，左右两派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上纲上线的矫情色彩：如果要说道德，如果你是骚乱参与者，身处在帮派文化圈里，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能出淤泥而不染；同样你自己作为随时可能被砸上门的市民，又是出于何种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心态为暴行开脱？如果真的要找出让良民跨过一步之遥成为市井无赖的分界线的话，不如去审视下这个社会是如何把贫富、族裔、社区之间的矛盾这些“虱子”，掩藏在华美的外袍下，却从未真诚地想过去解决它。

斑斓而光怪陆离的“多元文化”

伦敦那些重灾区——克洛伊顿、伊灵、布里克斯顿，找一个词去形容这些地区与众不同的特质，也许最适合的就应该是“多元文化”，它们并不一定是伦敦最贫穷的地方，却一定齐聚着各色人等。在这里你能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开着各种别有小餐馆和外

卖店、有浓郁的街头文化、有个性十足的艺术圈子，也有收入体面、生活两点一线上班族。事实上这也是伦敦的迷人之处所在，在一个没有“美国梦”式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所谓民族大熔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能够以自己的步调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不刻意张扬，却都能用一种高昂着头的平民精神彰显自身魅力的同时、很有风度地相互打量。这座城市赋予了“多元文化”英国式的含义：五彩的烟花在沉静中绚烂，仿佛伦敦阴霾天空下那标志性的红色电话亭。

不过，这应该仅仅是伦敦旅游手册上会出现的文字。真正的所谓“多元文化”，早已被政客浓妆艳抹成用来遴选民亲睐的政治当家花旦。大部分上街肇事的青少年都是所谓“布莱尔的孩子”（Blair's Children）。他们也许是第二代移民、他们也许来自工人家庭、他们享受布莱尔时期新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接受廉价的公立教育、毕业以后还能自动被纳入“青年工作”计划（youth work），无论是多么难找到工作的“老大难”，都能为你安排到不一定体面却也像模像样的一份工作；他们拥有一切，廉价又款式多样的衣服、电子产品、通过网络与世界实时接驳；但他们又一无所有，技能、前途和还贷能

力……来自政府公共开支的施舍并不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政府所保证的社会公平，相反却制造了一个代代相传、穷人只能以排斥主流的方式继续生活的底层阶级。

帮派文化也因此滋生，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聚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让自己在“多元文化”中有一小片领地。是的，这就是你所见的多元文化，如同迷信一样，政客在热情宣扬它的同时，却没有解释现实中操作性的基础，结果便是模糊了对错之间的界限，对都市帮派文化的解读变成了所谓倾听非主流文化的心声，自己也制造出了同主流社会敌对的底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伦敦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元素其实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文化对抗色彩，例如著名的诺丁山狂欢节。1958年在诺丁山曾发生过一起有色人种与白人青年之间的暴力冲突，起因仅仅是因为几个白人青年向一位嫁给牙买加人的瑞典女士发出言语挑衅，随后居然逐渐演变成大规模骚乱事件。次年，150万人在事发当地组织了游行活动纪念这一事件，其中有色人种和白人青年俱包括在内。所幸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以乱剧始，以喜剧终。随后每年的诺丁山集会渐渐淡化了政治色彩，成为了一桩文化盛事。可见社会阶层和族裔间的妥协是要付出代价的。

道德文章能否解决问题

对于本次骚乱，首相卡梅伦的强硬态度，是危机处理的风向标，也是向全社会发出的震慑。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强硬也只能是震慑而已，意味着它事实上只能对没有参与骚乱的“良民”有效。可怜之人根本不在乎首相一脸义愤填膺的“后果很严重”，反正作为底层，再糟糕也没法糟糕到哪儿去了，即便是“二进宫”，出来以后一定会有社



8月15日，伦敦市长鲍里斯加入市民自发组织的扫帚游行

会服务机构保姆似地帮助你“回归社会”。可耻之人的可耻，无非是更可耻一些，跟风去抢点东西与平时的那些小打小闹比，本质上没有区别。

就如同把妓女称作为“失足妇女”一样，当你对社会矛盾赋以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来描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成为了一种回避问题的方式。当全社会都以一种自由主义、反歧视的姿态来看待社会底层和少数族裔的时候，人们也就失去了点破问题实质的勇气。

也许，当下英国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他们为这个“道德水平下降”的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否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情假意。至少在目前看来，保守党所倡导的“大社会”尚未证明自己是一个可靠的意识形态，所谓加强公民的社区责任意识，目前看来还停留在削减开支的技术层面上，且收效欠佳，也很难看出这种没有经济基础的理念能够释放出多少的能量，难把边缘青少年拯救成有道德有责任的好公民。

相比工党的“多元文化主义”，“大社会”可能更糟糕，因为它在揭去多元文化暧昧的面具的同时，又给选民开了一张更不靠谱的空头支票，同样是作为缺乏深度又没有理论依据的方针，“大社会”连漂亮的外壳都没有。

专业民意调查机构YouGov的测试显示，虽然超过81%的民众支持卡梅伦对打击犯罪的决心，但对于政府对所谓“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开出的道德药方却存在着很大分歧。就像布莱尔在《卫报》上撰文批评卡梅伦，拿没有实质依据的“道德”做文章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虽然布莱尔自己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始作俑者，但他对卡梅伦的“道德”反扇的这一巴掌，在破碎的现实面前，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英国骚乱使经济复苏步伐放缓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汪巍

8月发生的英国骚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些年英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刑事犯罪、医疗健康、生活压力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在英国变得越来越突出。高失业率、财政削减、经济不景气、种族和文化冲突，以及年轻人和警察之间的矛盾，都是造成这次骚乱的原因。

自从去年英国两党联合执政以来，英国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学生抗议、工厂罢工、工会游行……逐渐激化的社会矛盾引发了今年8月蔓延好几个城市的骚乱。这些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无所作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执政十余年的工党黯然下台，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削减约50万个公共职位，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遭到压缩，但收效并不显著，今年二季度英国经济增速仅为0.2%，就业形势依旧严峻。英国经济不景气导致英国普通民众现在的生活状况大不如前。例如，这次事件爆发的托特汉姆地区，在伦敦各区贫困率的排行中名列第四，托特汉姆有超过1万名当地居民要靠领取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度日，失业率高达8.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倍，托特汉姆每开放一个新的职位，就会吸引54名应征者，当地人均寿命比伦敦平均水平低5岁，各类犯罪较为多发。拥有22.55万人口的哈灵盖（托特汉姆所在的行政区），其贫困程度在全伦敦所有33个行政区中排名第四，在全英排名第十三，该区55%的居民在全英属于最贫困的人群，2011年6月哈灵盖区的盗窃和抢劫的发生率明显上升，已从去年的同期的884起升至1204起。而8月7日晚上遭到暴徒袭击的布瑞克斯顿（Brixton）街区所属的兰贝斯（Lambeth）行政区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该区贫困度排名伦敦第五，全英第十九。

英国民众对英国的警察早已存在不满情绪。这些年，每次出现警察与民众的冲突时，最后民众的利益总是得不到保护，故此次伦敦警察的枪击事件大大地激发了这一矛盾。由于不满情绪在民众心中早已存在，所以伦敦的骚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

英国近几年来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10%的富人占据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的收入总和比其余人口的收入高了近100倍。近几年英国经济的不断恶化使得英国民众的手头更为拮据。与此同时，英国的社会流动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英国骚乱反映出当地社会矛盾尖锐，政府拿不出灵丹妙药。

从金融危机到目前的债务危机、增长乏力，欧洲经济和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并以极端的方式反映在英国骚乱中。英国经济、社会政策进退两难，催生了一些年轻人的反社会心理。伦敦骚乱不仅造成上亿英镑的经济损失，也使英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